

中国聚焦 郭良平

中共百年庆与苏共卅年祭

今年是中共建党100年大庆，也是苏共亡党30年之祭。发生在30年前的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政权骨牌式的倒塌，是对凯南（George Kennan）冷战理论中“骨牌效应”的绝妙讽刺，凸显了人们对共产党国家政治内在规律的无知。

苏联共产党退出历史舞台30年了，它的悲惨结局和俄罗斯不可逆转的下坡路，同中共领导下气势磅礴的大国崛起形成了鲜明对比。

苏共的跌落

苏共亡党这个历史性事变，对中国共产党的震撼极大。一个执政70多年，从贫穷落后中创造出一个超级大国和一个社会主义阵营，引领世界潮流几十年，经验丰富、成熟的大党，就这么一夜之间消失了。1000多万党员中，竟“无一男儿”挺身而出来捍卫这个给了他们一切的党。

苏联解体的那个夜晚，一个中国驻莫斯科记者想看一看老百姓对这个划时代事件的反应，于是走上莫斯科街头游荡。他看到了什么呢？什么都没有！莫斯科一如既往，一片茫茫夜色。苏联老百姓和苏共党员抛弃了这个党，对它的存亡漠不关心。

苏共也有它的辉煌年代。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化速度史无前例，苏联模式是二战后新独立国家的首选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曾经涵盖了几乎一半的人类，苏联青年在卫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表现出来的巨大热情、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，仍然是中国当前一代领导人的精神源泉。

苏共垮台前的一次民调显示，认为苏共只代表自己利益集团（官僚、干部、机关工作人员）的占85%，只有7%认为它代表人民，4%认为它代表工人阶级，认为它代表党员的也只有11%。换言之，苏共完全抛弃了人民，甚至自己的党员，特权阶层化了。

有一件事典型地刻画了苏联的政治生态。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时，听众中有人质问：你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对斯大林的罪行？赫鲁晓夫立马发问：是谁提的问题，站出来！结果底下一片死寂。他于是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站出来的原因。

赫氏被赶下台前作最后一次政治报告时流着泪说，同志们都没有诚实地公开指出我的缺点和错误，对我说的一切都随声附和及表示支持，你们也

“中国模式”成为唯一仍屹立的挑战者，但“共党国家”是西方和世界许多国家绝不可接受的，为此它们不惜用新冷战、脱钩等来阻止“赤祸”的再现。它们脑海里的“共党国家”仍基本停留在冷战时代，与当今的中国有天壤之别。中共如何跳出这个陷阱，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，这要靠大胆创新。

缺乏原则性和勇气。

中共的崛起

中共在过去40余年所取得的成就，是任何政党都可引以为豪的。它也造就了一个超级大国，在辉煌上可与苏联媲美，在根基和持续力上则超越了苏联。这些同中共改革开放以来所走过的道路和采取的政策及策略分不开。

回顾改革开放的历程，最初的20余年是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在邓小平的推动下，大胆破除束缚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和计划经济体制，大力推动市场化。农村改革促使乡镇企业异军突起，到1994年就贡献了工业总产值的几乎一半，连邓小平都大吃一惊。对外开放使外资、先进技术、管理、各种人才、稀缺产品和原材料等大量涌入，大大缩小了各领域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，也造就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。

在放权让利的激励之下，可以说各级地方政府，上到省市、下到村镇，是第一批大手笔的创业家，也是市场化的推手。地方利益肢解了中央计划，将计划经济抛入了历史的垃圾箱。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、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上相互攀比，相互学习，相互竞争，形成了市场竞争之外的又一个发展引擎。

双引擎的推动下，中国经济产生了继亚洲四小龙之后一个更大、更持久的奇迹。根据当地的条件，地方政府创造出许多地方发展模式，包括著名的苏南和温州模式，创造、创新蔚然成风，中国经济充满了活力。

改革开放的前20余年快速增长，是市场化的利益驱动的。这是水涨船高、大家都得利的时代，因而动力十足。

90年代后期以来，改革红利开始向权力倾斜，主要获利者是地方政府，背靠权贵人脉的垄断寡头和其他既得利益集团；改革的成本则主要由平民百姓承担，譬如市场化导向的房改、医改和教育改革、国企改革等。

进入胡温时代，社会矛盾突出；粗放工业化、

城市化、社会转型、大规模人口流动和重组，造成诸多社会和环境问题。城乡、贫富差距和平公正义成了社会舆论热点，也逐渐成了决策者关注的中心。和谐社会与科学发展观就是针对这些问题而提出来的。

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政府长期被利益集团把持不同，中共始终没有彻底忘掉“初心”，也有同利益集团作斗争的勇气和能力，即使这些集团出自内部分。

从胡温的“新三民主义”（权为民所用，情为民所系，利为民所谋），到习近平新时期的“主要矛盾”（即“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”），其精神本源都是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初衷，即破除骑在人民头上的特权阶层。

毛泽东已经看到苏联模式的末路——比凯南高明多了，极力想避免中国蹈之覆辙，但未能成功。习近平最近将这个民本思想，即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观，提升到“民心就是江山”，“坐江山”就是得民心的高度，视之为中共不败之本。这是他从苏共灭亡中得来的一个主要教训。

中共成功的另一重要因素，是它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冲击下，仍然基本保留并改进了毛泽东时代创建的大一统制度。这个制度的优势，除了中共常提到的“集中力量办大事”外，还包括维持国家统一、社会稳定和民族凝聚力；培训和历练官员；长期规划和全国一盘棋的基础设施建设；推动教育、扶贫、生态保护和恢复；科技攻关；区域协调发展；顶层设计与局部试点相结合的应变和创新能力等等。这些能力在巨变时代必将越来越凸显其重要性，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。

中国崛起最重要的因素，是有一个能够不断自我净化、自我完善、自我创新和自我提高的执政党。从毛泽东时代起，“党的建设”就是一个从不间断的“伟大工程”。毛泽东用各种运动来保证党不官僚化和僵化，有活力和紧密联系群众。

改革开放开始于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辩论或

思想解放运动；市场化后提出了“三个代表”的理念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，以适应更加复杂的社会；之后又陆续提出了建立学习型政党、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等措施，以应对“四大考验”（执政的考验、改革开放的考验、市场经济的考验、外部环境的考验）和四大危险（精神懈怠的危险、能力不足的危险、脱离群众的危险、消极腐败的危险）。

习近平执政后的大规模反腐，不仅可以振士气、立新风、聚民心，也是攻克既得利益集团的有效办法。然而，反腐虽可以化解阻力，却无法提供新动力来替代业已消失的“水涨船高”形势。新的动力和活力必须从制度设计中产生，从精神力量中获得。

集大成的时代

邓小平曾说：“再有30年我们才能形成一套比较成熟的制度。”30年后，习近平启动了“四个全面”（全面深化改革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，全面依法治国，全面从严治党）的大规模制度建设，以集改革开放经验之大成；目的是为今后长期的经济社会发展打下制度基础。

百年巨变下的国际形势也是一个集大成的时代。苏共倒台时，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，30年后的西方陷入重重困难，新自由主义成为众矢之的。改革的呼声在西方不断高涨，但缺乏蓝图，造成左右极端化、民粹主义大行其道、特朗普当选和英国脱欧等乱局。

“中国模式”成为唯一仍屹立的挑战者，但“共党国家”是西方和世界许多国家绝不可接受的，为此它们不惜用新冷战、脱钩等来阻止“赤祸”的再现。它们脑海里的“共党国家”仍基本停留在冷战时代，与当今的中国有天壤之别。中共如何跳出这个陷阱，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世界舞台上，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，这要靠大胆创新。

这也是一个创新的时代。有人甚至认为，人类正处在第三个轴心时代：第一个轴心时代产生了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、苏格拉底、孔子、孟子、释迦牟尼等先哲；第二个轴心时代横跨文艺复兴、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，产生了现代文明的一大批巨人（包括马克思）。

当今这个巨变的时代，也在呼唤自己的开山祖师。中国注定了要在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，是主角还是配角？是正面角色还是反面角色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领导人如何对待苏联的遗产，能否有超越的眼光。

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